



第一部分 文章及譯著選

1. 中國革命中的爭論問題——托洛次基著《中國革命問題》中文本導言
2. 《帝王術》譯者序及譯後記
3. 托洛次基《文學與革命》中譯本出版小序與譯後記
4. 解嘲——《三齣小戲》(代序)
5. 伊·多伊徹《流亡的先知》與中國托洛次基主義運動——我的意見和更正
6. 托洛次基主義與中國革命——托洛次基著《中國革命問題》德文本導言
7. 《托洛次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譯者弁言
8. 致李福仁信
9. 致《十月評論》編輯部
10. 《謊言與真實》序
11. 推薦一本必讀書
12. 中越共運史的真實一頁——胡志明與中、越托派
13. 略談《悲劇》及其作者——托洛次基寫給伊羅生的九封信(1935-1938年)譯者序
14. 評《中國托派史》
15. 「走你的路，讓別人去說吧！」——《陳獨秀最後論文與書信》英譯本前言
16. 陳獨秀散記
17. 記汪孟鄒先生
18. 悼念彭述之
19. 從魯迅的一封信，談到陳其昌這個人
20. 胡風遺著讀後感
21. 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
22. 〈王實味與野百合花〉讀後感
23. 王實味冤案平反的餘波
24. 悼靜貞
25. 懷念宋雲彬與許志行
26. 悼李福仁
27. 悼念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樓國華
28. 悼鄭超麟

1. 中國革命中的爭論問題

托洛次基著《中國革命問題》中文本導言

中國革命與俄國共產主義者

所謂中國革命問題，主要乃是指 1925–1927 年中國革命過程中所發生過的問題，革命失敗後所曾發生的問題，以及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及其前途的一些基本問題。大家知道，中國發生那次革命的時候，中國底工人階級與中國共產黨起了極大作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第三國際底一個支部，是受命於當時這個國際革命底總參謀部的。大家又知道，目前當權的國民黨，在那次革命之前，更正確些說，在民國十三年改組之前，是沒有力量的，只是一個上層官僚與政客底集團。它之擁有力量，以及它後來之霸佔政權，都全部或一部由於共產國際與蘇聯底幫助。因此，那次中國革命所發生的一切問題，差不多全與莫斯科底共產主義者有關，而為他們所討論。

共產國際與蘇聯之援助中國革命是應該的，是分內的。這是一個無產階級業已勝利的國家，對正在革命國家底無產階級之應盡的責任。除了帝國主義與反動的國家主義者外，沒有一個人會說此種革命援助便是「干涉」了中國內政。所以問題不在於這援助與「干涉」底

編按：本文原為 1947 年初版《中國革命問題》的「校譯者序言」，為使讀者容易了解當時史托之爭的癥結所在，印入《史大林與中國革命》小冊子時，改題今名。

本身，而在於如何援助與怎樣的援助。同時問題也不在於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之領導本身，而在於這領導是正確還是錯誤。

做了這點必要的聲明之後，我們可以進而談所爭論的問題了。

在那時候，蘇聯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內部，對於中國革命問題，隨着事變底進展與問題之提出分成了二派。一派以史大林為首，另一派則由托洛次基領導。史托二人當時都是蘇聯共產黨政治局委員兼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不過當1925年前後，因蘇聯內外局勢右傾結果，偏右的史大林派顯然佔了優勢，所以史大林一系關於中國問題的主張，便成為共產國際底正式路線，成為中國革命底指導方針了。托洛次基不同意這個意見，在許多重要問題上都提出了不同主張；但均以少數而被否決，不能見諸實行，甚至不能公諸報章。最後，中國革命被史大林底路線所斷送，事實反證了托洛次基底正確。照理說，主張正確的人應該可以勝利了；但實際階級鬥爭底行程卻是違反着理論思考的，中國革命底失敗加速了世界局勢底右傾，這右傾則幫助了史大林底右派，使它摧殘了托洛次基底左派反對派組織。托洛次基和他成千成萬的同志被開除，放逐，幽禁，槍殺，他的思想更被壓制與誣蔑了。

在中國革命完全失敗之後，托洛次基一派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見解才為中國底一些革命者所知道。根據着在中國實際從事革命的經驗，中國許多共產主義者，包括第二次革命底領袖人物陳獨秀在內，認識了這個理論，完全同意了它，並且在中國共產黨內形成了一個左派反對派，後來成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究竟托洛次基底見解比之於史大林底路線有什麼不同，它的正確究竟在哪裏，那末現在事後研讀這些文章，是很容易判別出來的。不過現在我們印出這些文章來，重要的當然還不在於判別過去的是非，

而在於從這些是非中得出教訓，以便正確了解中國革命問題底本質，復由此了解以保證中國未來革命底勝利。

為了讀者較易把握文中所論的問題起見，我們在這裏按照時間先後，將各個重要問題先行敘述一下。

我們可以把問題分成三類：——（1）革命時期；（2）反革命時期；（3）關於革命性質與前途的。

革命時期底爭論問題

革命時期爭論的問題，主要有如下四個：

一、無產階級政黨底絕對獨立問題。這是最早發生的一個問題。這問題在中國發生時所採取的具體形式，便是共產黨是否應該加入國民黨。俄國共產主義者在 1923 年就開始爭論了這個問題。當時史大林一系贊成加入國民黨，理由是：國民黨是群眾組織，是各階級底聯盟，所以共產黨可以與應該加入進去，以便爭取群眾，爭取領導，同時與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共同進行國民革命。托洛次基堅決反對加入國民黨。他認為，國民黨不是一個普通的什麼群眾組織，而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共產黨在任何條件之下都不能加入一個資產階級政黨，更不能服從其紀律，信仰其主義。為了爭取群眾，為要保證對全體革命群眾的領導權，更為要保證革命勝利及其有利於社會主義方向的發展，則共產黨必須在組織上與思想上絕對獨立。

托洛次基這立場未能在 1923 年被採納，中國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1925 年他提議退出，遭否決。1926 年 3 月 20 日蔣介石廣州政變後他再提議退出，仍遭否決。中經 1927 年 4 月 12 日上海屠殺，再經

武漢國民黨之屠殺工農與7月間之正式清共，事實上已經沒有任何一派國民黨可以讓共產黨「加入」了，而史大林還是不肯放棄青天白日旗。直到1927年12月廣州暴動之前不久，才算確定地認為加入國民黨已經不可能了。

在「聯合反對派」時期底文件中，托洛次基並不說加入國民黨是原則上的錯誤。他只是說，應該立即退出國民黨，因為那時的情勢已不容共產黨再在國民黨內了。此種說法是他對齊諾維也夫派的一個讓步。他事後承認，這一讓步曾是錯的。據他的本意，共產黨不管在什麼時候都不該加入其他階級領導的政黨。

二、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問題。這問題是以如下方式提出來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究竟加緊了中國底階級鬥爭呢，還是消滅了它，或者至少緩和了它？據史林一系底見解，帝國主義底壓迫使中國內部的階級鬥爭減少到最小限度。因為從資產階級起一直到無產階級，都受着帝國主義底壓迫，所以為要反對這個壓迫，史大林以為中國底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民與工人階級可以結成一個「四階級聯盟」，採取國民黨形式。由此，他更得到一個結論：中國資產階級除了一小部分與帝國主義直接勾結的買辦之外，乃是與帝國主義對立的民族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是革命的，而且能領導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北洋軍閥的革命的。

托洛次基猛烈地反對這個立場。他認為「以為帝國主義機械似地從外面焊合了中國底一切階級，那是大錯特錯。……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不會減弱，但會增強諸階級底政治分化。帝國主義是中國內部關係中一個很強的力量。這個力量底主要來源，……是外國資本

與本國資產階級間的經濟與政治的聯繫。」至於「民族」資產階級，則據托洛次基意見，與買辦資產階級之間「無鴻溝之隔」。他說：

「這兩部分資產階級之間，比資產階級與工農之間，要無比地更接近些。資產階級之參加民族戰爭，有如內部的制動機，他們以繼長增高的仇恨看待工農群眾，愈來愈準備和帝國主義者妥協了。」所以他特別提出列寧底話作為警告：「工人們必須叫民眾對資產階級政客底欺騙睜開眼睛，必須教他們不要信任空話，而只要信賴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自己的組織，他們自己的團結，他們自己的武裝。」他特別反對史大林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革命的那種說法。

中國上次革命特別明顯地證出了這二種意見底誰是誰非，一連串的「民族」資產階級底屠殺工農打破了史大林底神話；可是史大林一黨直到今天還不曾由此獲得教訓，直到今天還以為「民族」資產階級是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的，因此是革命的，甚至可以和工農聯合起來「領導」革命的！

第三、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問題。這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對於中國社會中數量最大分子最雜的中間階層，應該採取怎樣態度。史大林派以階級合作政策去迎合小資產階級底上層領袖，去聯絡鄉村中的上層分子，特別是拉攏一些知識分子。他們以對汪精衛、鄧演達、宋慶齡等人的勾搭，代替了爭取廣大中間階層的革命責任。托洛次基反對這個路線。他認為這問題「對於中國及東方各國有極重大的意義」，而史大林一系對此問題所採取的卻是門雪維克態度。他說：「我們反對派說無產階級應與小資產階級有革命的聯盟，我們所指的是被壓迫階級底幾千萬幾萬萬的城市的與農村的貧民。」要締結這樣的聯盟，那末當

然，不能通過階級合作，而必須是工人階級領導城市與鄉村的廣大貧民，從事最徹底的階級鬥爭與土地革命。

中國史大林派在這問題上也不曾學習到什麼，他今天施之於民主同盟的政策，也還是昨天施之於汪精衛「左派」國民黨的政策。

第四、蘇維埃問題。托洛次基派依據着俄國兩次革命底經驗，當1926年北伐軍進入湖南，引起了無疑的革命進潮之時，就提議在中國開始組織蘇維埃，藉以匯合蜂擁而分散的諸股革命力量，藉以統一下層的鬥爭群眾，更藉此以實現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真正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的統一戰線，由此防止軍人，「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領袖們底反叛。史大林派竭力反對這個提議，理由是（1）蘇維埃將破壞對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2）將予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以反對中國革命的新理由，說中國革命是俄國革命之「人工移植」；（3）蘇維埃只是暴動機關，只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底機關；（4）中國國民黨已經是實際上的蘇維埃。

這些理由之不足恃，為歷史事實或史大林自己的行為所駁斥了。沒有蘇維埃，資產階級仍舊一再地破壞了聯合戰線；沒有蘇維埃，帝國主義者一樣在說中國革命是從莫斯科輸入的；說蘇維埃只能在暴動前夕建立，那末1905和1917年底俄國蘇維埃，都是在革命進潮底初期就建立了的，只有經過相當時期的群眾鬥爭，蘇維埃業已在群眾中有了信仰，才能談得上領導暴動，廣州蘇維埃正因為是在「暴動前夕」建立起來的，所以不能保證暴動底勝利；至於說蘇維埃只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底機關，那末當1927年12月11日廣州暴動以後，史大林在中國提出了蘇維埃，卻仍宣佈中國革命是民主性的，就已打了自己的嘴巴了。最後，究竟國民黨是否可以代替蘇維埃，則歷史已證

明得太清楚：一個由資產階級控制的政黨，和由被削階級全體選舉的因而反對資產階級的蘇維埃之間，是沒有共同之點的，結果也已經證明了這個不同作用了。

這四個爭論問題決定了中國上次革命底命運。現在，你們如果記起那時革命底實際發展，再如果你們因為年青，沒有經過當時的事變，那你們可以同時研究這一段時間的中國史，最好拿美國人伊羅生所著的《中國革命的悲劇》來參閱，那末你們就會清楚，史大林派表現在這四個問題上的見解，最有力地幫助了中國資產階級國民黨反動派底勝利，幫助了帝國主義統治底重趨穩定，幫助了中國共產黨之被摧殘與工農大眾之被屠殺。反之，托洛次基底意見，都是及時與先提出來的，如果能夠實行，那末即使不能保證勝利，則至少能防止如此悲劇之發生的！

托洛次基和史大林的爭論，雖然表現在這四個不同的具體問題上，而實際只是兩條路線底衝突。革命的階級鬥路線爭對抗着妥協的或投降的階級合作路線。無論在哪一個問題上，都不過是這兩個路線底表現罷了。為什麼階級合作底路線促成了革命底悲慘失敗呢？還原到最後來說，那是因為在階級社會中，尤其在資本主義關係的階級社會中，階級合作與實際的社會發展不相符，尤其與革命時期的階級關係不相符。誰主張階級合作，誰實行階級合作，誰就被階級鬥爭所碾倒，所壓碎。在資本主義關係佔優勢的社會裏，一切種類的階級合作政策，都只能有利於資產階級，幫助資產階級實行欺騙。

史大林底階級合作路線斷送了中國底一次革命，革命失敗卻沒有完結了史大林派底錯誤政策，它發展着，延長着，加深着，藉以準備斷送未來的中國革命。這時托洛次基根據了中國無產階級以無量數的